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七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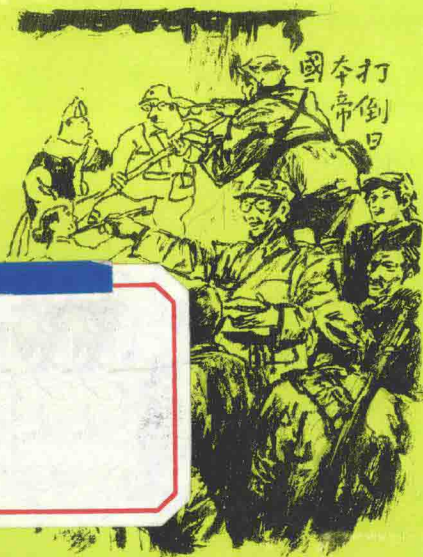
总主编/李玉明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事业

张国祥

著

在贫困、偏僻的落后山区，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之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硬是把文件事业也搞得红红火火，创造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王灵善
 张建英
复 审:石凌虚
终 审:杭海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事业/张国祥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 9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7辑/李玉明主编)
ISBN 7-203-04665-6

I. 山… II. 张… III. 农村革命根据地—文化工
作—史料—山西省 IV. K26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1027 号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七辑
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事业
张国祥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125 字数:300千字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套

*

ISBN 7-203-04665-6
K·272 定价: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任继愈
马 烽 姚奠中 侯伍杰 申维辰

主任委员：赵雨亭

副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牛崇辉	白 云	任茂棠
刘 江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杨建峰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颌
张国祥	张根玉	张捷夫	罗广德
武丕仁	赵劲夫	赵瑞民	赵曙光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高培湖
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
谢 恺	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

录

一、教育事业	(1)
(一) 关于干部教育	(1)
(二) 关于社会教育	(3)
(三) 关于学校教育	(7)
二、新闻出版	(14)
(一) 太行区的新闻出版	(15)
(二) 北岳区的新闻出版	(18)
(三) 晋绥边区的新闻出版	(20)
(四) 太岳区的新闻出版	(24)
三、文学艺术	(25)
(一) 关于诗歌	(26)
(二) 关于报告文学	(29)
(三) 关于小说	(30)
(四) 关于戏剧	(32)
(五) 关于音乐美术	(34)

引 子

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都处于省与省交界的山区地带，一向文化落后，不用说大知识分子，就是连小知识分子也为数不多，广大农村几乎是一个文盲的世界。尽管这是历史积淀下来的陈旧老账，但它同新的革命时代，同争取独立、自由的抗日战争时代，是极不相适应的。正如毛泽东深刻指出的那样：“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此，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特别是在抗日根据地开创和发展时期，普及教育，从多方面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就成为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

一、教育事业

根据地的教育，可分为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三个门类。

（一）关于干部教育

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共产党组织就把干部教育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时，为着解决干

部缺乏的问题，从中共中央北方局到新建立的中共晋察冀省委、冀豫晋省委、晋西北省委及山西省委，都普遍开办了干部训练班。这些训练班虽然条件极差、时间很短，但它却适时地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为抗日游击战争的勃兴和根据地的开辟作了极为重要的组织准备。刘少奇指出，“当时我们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其中“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开办了许多一星期卒业的训练班，把这些人立即分派到各地去进行工作”。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尤其是毛泽东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提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的要求以后，旨在培养干部的各级各类学校，便在各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起来。一是党校：有中共北方局和分局的党校，有省委或区党委的党校，也有地委党校等。二是由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即“抗大”）在各根据地设立的分校：在太行区，就设立过抗大总校和5个分校；在太岳区，设立过抗大一分校和太岳分校（原抗大太岳大队）；在晋绥边区，设立过抗大七分校；在北岳区，设立过抗大二分校等。三是其他学校：在太行区，有“冀太联办”的抗战建国学院（后同太行一中、二中、三中合并为太行联中）、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即“鲁艺”），以及民族革命干校、群众干校、青年干校、军政干校和各所中学等；在太岳区，有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民大第一分院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分校及医学院，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其前身为河北民军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决死第一纵队教导大队，太岳军区陆

军中学，太岳第一中学、第二中学、晋豫中学等。在晋绥边区，有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晋西北抗战学院、青年干部学校、晋西北师范学校（由抗战学院改称）、边区新民主主义教育实验学校、民运干部学校、行政干部学校、财政干部学校、成成学院、鲁艺分院、西北艺校，及晋西北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中学等。在北岳区，有华北联合大学（即“联大”）、抗战建国学院、法政学院（由抗战建国学院和联大社科院合并而成）、边区军事学校、军政干部学校、卫生学校、蒙藏学校，以及各专区设立的中学和各种专业训练班等。各根据地的这些不同类型的学校，其必修课程的设置，大同小异，一般有政治理论、军事知识、时事政策、社会发展史等。办学条件，都很艰苦，没有固定校舍，没有齐全设备，没有充裕经费，一般都是依靠师生自己动手，打窑洞，盖土屋，制作教具，生产粮食蔬菜。尽管如此，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出大量数量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干部。例如，在太行区的抗大总校和5个分校，前后7年时间，即培训军政干部达1.7万余人；在北岳区的华北联大，建校6年时间，毕业学生即有近万人。这一批又一批人才的造就，为各根据地建设事业的全面大发展提供了干部保证，很好地适应了长期抗日战争的需要。

（二）关于社会教育

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即一般成人教育，主要对象是人民大众，首先是农民大众，其根本任务是：一方面进行民

族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民族自尊心，增强他们参加抗战的自觉性；一方面进行扫除文盲，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增长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就一般而论，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大致可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1939年以前，社会教育主要是通过开办民族革命室（即“民革室”）或“救亡室”进行的，亦称为“民革室”和“救亡室”阶段。在“民革室”或“救亡室”里，向群众报告抗战形势，讲解有关抗战的政策、法令，组织群众认字、学文化，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因此，“民革室”和“救亡室”既是农民群众政治教育的场所，又是农民群众学习文化和娱乐活动的中心。由于群众基础雄厚，“民革室”和“救亡室”在各地发展很快。例如，在太行区，“民革室”最多时，即达到2560余个。1939年以后，开展冬学运动成为进行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所以又称作冬学阶段。最早开展冬学运动的是北岳区。1938年秋末，中共晋察冀省委机关报《抗敌报》曾专门发表论述开展冬学运动的文章，并提出了开办冬学的十条具体办法。这年冬天，仅阜平一县（二区不包括在内）就开办冬学190多处，入学农民达7612人。1939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特地发表《开展冬学运动》的社论，号召各地的党组织和民主政府，在广大农村中开展冬学运动，通过冬学运动去教育民众，并扫除民众中的文盲。从此，冬学运动便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起来。1940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提出，更加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工作，使冬学运动

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声势，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940年8月，“冀太联办”发布关于开展冬学运动的计划，提出以“扫除文盲”为中心任务的冬学运动，“是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重要工作之一”，规定从专、县到区、村，各级都要组建冬学运动委员会，以领导冬学运动的顺利开展。为此，“冀太联办”还特别开办了民众学校教员讲习所，专门培训冬学的教员和领导干部，并且拨出专项经费，资助各地冬学运动。1941年12月，晋西北行署发出《关于冬学运动配合反“扫荡”战争的紧急指示信》，同时颁布《民国三十年冬学工作计划》，就冬学的性质与任务、具体要求、组织领导、经费与教材、工作步骤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要求：在内地县份，凡工作基础较好的，平均每个行政村开办冬学二至二个半；接敌区县份，工作基础较差者，平均每个行政村开办冬学一至一个半；各地模范冬学，应占到全数冬学的5%。1942年2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民众学校暂行规程》。同年冬，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冬学教育实施大纲》，以识字多少，将学员分编为四个年级，并对各门课程所占的比重和应达到的标准，均作了具体规定。1943年4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实施《民众学校暂行规程》，强调扫除文盲要从长计议，并且将公民识字标准作了调整，由原来4年认1000字提高到1200字。1944年10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强调冬学应以提高群众文化为中心，着重开展识字运动。同时对冬学的内容与重点，以及组织领导问题，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和太行军区亦发出《关于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提出了部队和冬学运动的关系问题，要求部队不但应积极参加冬学运动，而且要帮助驻地村庄的冬学运动。由于各边区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重视与扶持，由于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的普遍深入开展，各根据地冬学运动的热潮便一浪高过一浪，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1944年，在太行区的冬学即达到4836个，入学农民多至415955人。同一年，在晋绥边区，仅6个专区开办冬学达1810个，入学农民为132820人。这一年，太岳区开办冬学3131个，入学农民达到20万人；到1945年，全区冬学更增至5000个以上，入学农民则多达30万人。在这一时期，北岳区的冬学运动已臻于完善，不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而且使广大群众在识字和珠算上都取得了特别显著的成绩。

值得指出的，各根据地妇女群众在冬学运动中所表现的巨大热情和积极性。由于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在经济上赢得了独立的地位，因而对文化的要求就迫切起来，成为冬学运动的热烈拥护和参加者。1939年，以北岳区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冬学增加到5379个，其中女冬学即达3500个；入学人数由18万扩大至390459名，而又以妇女入学人数增加最多。在太岳区，1940年开办妇女冬学或识字班532个，参加学习的有12496人。在晋绥边区，从1944年冬到1945年春的冬学运动，仅河曲、保德、临县、交城、偏关5县，入冬学的妇女就达到13628人。在临（县）南和离石两县，入冬学的妇女更为普遍。

而且，各地冬学在扫除文盲的过程中，同时还培养了

一大批人才，充实和加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农村的骨干力量。在北岳区，仅一、四两个专区，即造就冬学教员达 5988 人，其中有一部分人竟提升为小学教育，一部分人当了文化工作干部。在晋绥边区，只河曲等 5 县的 84 个冬学，提拔当了抗联、行政、生产、民兵等干部的即有 193 人。

就整体而言，由于冬学运动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深入的开展，广大农民群众民族意识的增强和抗战知识技能的提高，使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中得以顺利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减租减息、互助生产、交纳公粮、民兵练武参战、动员青壮年参军等各项工作，大大促进了根据地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

（三）关于学校教育

根据地的学校教育，主要对象是广大学龄儿童。它实行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统一战线的义务教育政策，坚持教育和战争、生产、社会、家庭相结合，为当前的抗日战争、群众需要和民主政治服务，培养准备参加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未来人才，或为造就高级人才在文化知识和政治思想方面奠定初步基础。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对于学校教育是极为重视和抓得很紧的。在根据地创建伊始，就着手抓了小学校的恢复建立工作。随着根据地建设事业的开展，又突出抓了小学校的巩固和发展。尽管当时的各方面条件十分困难，但在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使根据地的小学教育逐步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

在北岳区，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首先是从学校教育的恢复开始的。鉴于敌人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军队与地方旧政权的溃逃，使晋察冀地区的原有教育工作迅速瘫痪和瓦解。“当边区社会秩序渐渐趋向稳定的时候，边区政府立即指示，所有各地的小学限期一律恢复上课。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修缮校舍，编撰课本，培训师资，筹集教育经费。为此，边区政府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教育行政系统，各级都有专管教育的机构。他们对恢复学校工作抓得很紧。”由是，到1938年5月，晋东北区的小学校全部恢复，以至原来没有小学校的村庄都建立了小学校，普遍推行儿童的强迫义务教育。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发出《关于国民教育的指示》，其中强调，应尽可能恢复与建设各地小学校，以求达到每个行政村有一所初级小学校，每区至少有一所高级小学校，从而建立起广泛的小学网。同时要求各地，应大批吸收与鼓励知识青年及过去的小学教员，担任小学教员的工作，开办各种小学教师培训班或讲习所，给以必要的培养训练，并有计划地在几个中心地区设立师范学校，或在中学附设师范班，以大批地培养男女小学教员。随着对中共北方分局指示的贯彻实施，北岳区的小学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41年1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关于普及国民教育的指示》，规定学龄儿童为7至10岁的男女儿童，要求入学儿童应平均达到学龄儿童的60%，已超过60%的地区，须提高至70%至80%，在工作基础差的地区，也要达到50%。并且规定，在小学内建立半日随习制度，以吸收贫苦子弟入学；每所高

级小学应设一定数量的公费生，以救济贫苦子弟之学生；应根据“一村一初小，一区一高小”的原则，普设学校，在不能设立之小村庄，亦须建立巡回小学，以吸收更多的儿童入学。由于这些规定切合实际，因而在北岳区贯彻执行后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半日随习制度的推行，山庄巡回小学的建立，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有效地扩大了儿童的就学面，使学龄儿童入学率普遍达到了规定的标准。尤其值得可喜的是，许多学校不但在教育与家庭结合上创造了好经验，而且在教育与战争结合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在工、农、青、妇和民兵组织的带动下，广大小学生充当了执行抗战勤务的重要方面军。他们当中，有的积极站岗放哨，成为社会治安的卫士；有的悉心侦察敌情，成为对敌斗争的前哨兵；有的设法救护抗日工作人员，成为根据地人民的骄子；有的捕捉汉奸、特务，成为抗战的小英雄。仅1942年，在完县、唐县和曲阳3县，被小学生捕捉住的汉奸就有90人、汉奸嫌疑犯达430人。为了进一步巩固与提高教育质量，把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更好地结合起来，于1943年4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整理小学加强儿童生产教育的指出》。到1944年10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又发布《关于研究与试行‘民办公助’小学的指导》，探索教育改革的新路子。在贯彻执行这些指示中，北岳区同样走在了前面，使小学教育达到了蓬勃发展的境地。

在太行区，恢复小学教育问题，最先是1938年中共冀豫晋省委在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会议上提出来的。同年6月，省委又在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尽快恢复与建立

小学教育问题。会后，即采取相应措施，首先恢复了专署一级的文教科。文教部门恢复以后，一边进行恢复小学教育的宣传工作，一边开展培训师资队伍，同时组织人马编写教材。随着这一系列工作的开展与进行，有效地推动了小学教育的恢复。到1940年8月“冀太联办”成立时，全区的小学校已有3770所，入学儿童达136000多人，大部分县恢复到了80%左右，有些工作基础较好的县份，则恢复的比例就更大一些。8月下旬，“冀太联办”召开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在明确规定根据地教育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制定了全边区各级学校规程要点方案。随后，“冀太联办”在12月召开的专员、县长会议上，通过了1941年的教育工作计划，提出了在全边区建立300所中心小学校的任务。接着，于1941年1月颁发了强迫儿童入学的暂行办法。同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以后，从边府到专区直至各县，均建立健全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并且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发展小学教育的法规，诸如小学校暂行规程、小学教员服务暂行条例、村立与私立小学校暂行办法、优待贫苦抗属子弟暂行条例、贫苦学生和敌占区流亡学生优待办法，等等。1943年3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国民教育的一封信，对太行、太岳区国民教育提出具体意见，指示各级党的组织、政府中的党团，应把国民教育当作自己经常的中心工作之一；要求每个编村设一所小学校，中心地区设一所完全小学校，每个专署设一所中学校；筹集必要的教育经费；抽调一定数量的干部到教育部门去工作和当教员等。同年10月，边区政府又颁发《加强学校教育的

决定》，提出适当增设小学校，解决教育经费，提高小学教师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的办法。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群众积极性的高涨，教职工的艰苦努力，尽管日本法西斯摧残破坏，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1940年的状况，但仍然取得了显著成绩。1942年，全太行区的小学校达到1237所，拥有学生52885人；至1945年，小学校又发展为2530所，入学儿童增加到125556人，较前分别增长105%和137%。从1943年到1944年间，仅二专区，小学校即由71所发展至137所，入学儿童由1207人增加到8220人，分别增长93%和581%。而且，各地还适应战争环境，创造了流动小学校、巡回小学校、联合小学校等多种办学形式。广大小学生多组织在儿童团里，一边读书长知识，一边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同时还担负站岗、放哨、查路条、传递情报等抗战勤务。

在太岳区，同太行区类似，其小学教育亦经历了一个“马鞍型”。在1940年日军大烧、大杀以前，全区小学教育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计有小学校1486所，教员1852人，“足够容纳全区的学龄儿童”；另有完全小学校3所、高级小学校15所，共有学生1100名。在1940年以后，由于敌人的烧、杀和破坏，使全区小学教育遭受到极大损失，有许多学校不得及时复课，学生数目大量减少。面对这种状况，于1941年7月15日，《太岳日报》特地发表《抗战第四年中太岳教育工作总结》专文，向全社会紧急呼吁：恢复与整理小学教育，克服学校学生锐减状况，是目前的战斗任务。据此，太岳区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

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有关指示与规定，积极筹集教育经费，加紧修缮被破坏的校舍，鼓励教师归队从教。经过艰苦努力的工作，使小学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1945年3月，全区初级小学校共有2351所，拥有学生92098人；高级小学校48所，共有学生4472人。到6月，小学校又扩大到2900多所，学生增至10万人以上。广大小学校坚持正确的办学方针，即使学生学到了初级的文化知识，又使他们为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还树立了热爱劳动的观念。

在晋绥边区，从1940年初晋西北行署成立开始，就认真抓了小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在颁布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政策的同时，即筹资修建校舍，编印教材，优待教师，使小学教育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至9月底，据19个县的统计，已有完全小学校26所、初级小学校1393所，共有学生61938人；每县平均有小学校74所，学生3295人。这些学校是在浴血奋战中恢复与建立起来的。是年春、夏、秋、冬，敌人对边区连续进行了四次大“扫荡”，仅汾阳、文水等18县，牺牲的小学教师就有101人，被烧毁的校舍达106处。即使在这样艰难而残酷的环境下，我们的根据地不但坚持了原有的教育阵地，而且还开辟与创办了许多新的小学校。据1941年5月12个县的统计，共有完全小学校28所、初级小学校1761所，总计学生达74959人；平均每县小学校增加到85所，学生扩大至3569人，与新政权建立以前的小学教育状况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以河曲、静乐、文水3县为例，较前增加小学校87所，增加学生12977人。

1941年，特别是1943年以后，全边区小学教育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中间，由于认真贯彻执行边区第二次教育会议和各县文教会议的精神，使小学教育无论在数量的发展上，还是在体现办学方针、政策上，在反对奴化教育、封建教育的斗争上，在进一步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上，在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办学运动上，在培养师资队伍上，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仅据晋西北区的不完全统计，1944年8月，共有小学校676所，其中完全小学校27所，初级小学校568所，中心小学校38所，民办小学校43所。至同年12月，小学校增加到968所，其中完全小学校24所，初级小学校690所，中心小学校33所，民办小学校222所。到1945年7月，小学校更增加至1097所，其中完全小学校30所，初级小学校617所，民办小学校449所。儿童入学率亦不断提高。1944年，据临县、临（县）南、离石、阳曲等4个县统计，共有学龄儿童16069，入学者达11433人，占71.1%。离石县入学儿童达到80.8%。有些办得好的学校，入学儿童的比率甚至高达86%至95%。在两年间，民办小学发展最快是一特点，以1945年7月与1944年8月比较，则增长了9倍。这充分表明，在政治、经济上翻身以后的广大农民群众，要求文化解放的迫切性和自办学校的积极性。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晋绥边区小学教育有许多的开拓与创造，其中从实际出发，从群众需要与自愿出发，开办了不同类型的学校：有从变工互助中发展起来的学校，有在教育工作全面开展下的一揽子学校，有通过冬学转变为